

黄宗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史料运用的特色

张剑平¹ 戴晓洁²

(1.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2.河北大学 老干部处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 历史资料是黄宗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和相关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部论著的史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日本满铁调查统计资料、历史档案资料和亲身的调查访问资料。建立在丰富的满铁资料、珍贵的档案资料和多次实地考察基础之上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加之兼融美国、日本和中国广阔的学术视野,使得黄宗智在历史学研究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外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黄宗智在历史资料的搜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在史料运用方面,还是有学者指出了他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全面解决,需要更为扎实的材料、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中外学者进一步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 黄宗智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 历史资料 运用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210(2012)04-0032-05

著名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着力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以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两部重要论著,在美国和中国学术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历史资料是黄宗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和相关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出发点。《华北》和《长江》两部论著的史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日本满铁调查统计资料、历史档案资料和亲身的调查访问资料。本文立足于黄宗智的两部代表性论著,对其历史资料的运用特色予以分析论述,以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满铁资料和历史档案资料的广泛使用

满铁调查资料是反映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的重要资料。正如黄宗智所言:“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它们的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它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1]这是作者在完成《华北》一书后对“满铁资料”学术价值的基本认识,这也是作者经过10多年的资料研读和比照得出的重要看法,由此可见满铁资料对于中国近代华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华北》一书第一编第二章“引用的史料与研究的村庄”,用了两节的篇幅,对满铁资料及其价值做了宏观的论述。作者简要介绍了1935-1942年满铁的三组调查资料和调查报告,并把这批资料与几乎同时出现的约翰·卜凯和国民党土地委员会以及社会学家李景汉的定县调查等资料做了比照,明确指出:“和当时其它农村调查资料比较,满铁在个别乡村和个别农户方面的调查显得详尽细致。以上三组调查,都以个别村落为分析单位。……透过这批资料,我们可以对个别农户和村庄做缜密的审查”^{[1]35-36}。针对学术界对满铁资料真实性的两种对立意见,黄宗智采取了理性的分析态度,他承认作为侵略当局主持下的社会调查工作肯定会受到限制,但同时,他根据当年被调查者的回忆和自己的两次亲身调查又指出:当时也存在着像沙井那样,调查者和中国农民关系处得较好的情况,加之当时的调查着重社会经济的内容,有意回避意识形态这类敏感问题,因而,这批资料“缺陷虽多,满铁调查仍不失为现存有关河北、山东自然村庄的资料中最详细、最精确的材料”^{[1]42}。根据满铁资料,黄宗智将33个自然村划分为7个类型,主要选取了包括冀东、冀中、冀南和鲁西北4个地区的9个村庄的详细资料,力图反映出整个华北的情况。附录一“满铁调查的33个村庄社会经济轮廓”,从主要作物、户数、非农业百分比、人均耕地、在村地主、租地

收稿日期 2012-03-18

基金项目 “河北省高校百名创新人才”资助项目(CPRC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剑平(1964-)男,陕西咸阳市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占耕地百分比、打短工百分比、各阶级农户百分比、参与手工业农户数、经营式农场主户数、关外就业户百分比等多个方面 极为细致地显示出了这 33 个村庄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正是在丰富而翔实的满铁资料的基础上,黄宗智撰写了《华北》一书的第八章至第十章的内容,显示出西方学者重视对生产力状况进行微观分析的重要学术特色。对于满铁资料,黄宗智主要通过大量表格的形式,来论述相关的问题。从第八章至第十五章,运用相关资料绘制的表格就有 34 个,详细反映了米厂村社会生产各方面的情况。此外,将河北与山东不同省份和地区的相关情况放在一起进行比照的表格也有 11 个。^{[1]3-4}正是通过满铁调查提供的翔实资料,作者对一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才能够进行细致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看法。《长江》一书同样重视对满铁上海事务所 1939-1941 年调查资料的运用,如第六章,依靠满铁资料作者设计了 6 个重要表格。从与华北进行比较的角度,对长江三角洲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做了微观的分析。

除了大量采用满铁资料之外,黄宗智还参考了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以及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使得他的研究能够上溯到明代并延续至清代末期,而不仅仅局限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华北》一书的写作过程中(1979-1980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永成等学者帮助下,黄宗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了清代的刑部档案和宝坻县的户房档案,这为他的华北研究提供了极其有用的资料。黄宗智对这两部分珍贵资料也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正如他所言:“我自己先后花了 4 个月时间,选取在 1736、1737、1796 和 1896 四年中,所有有关直隶、山东的诉讼档案,总计约三千宗”。关于清代刑科题本的史料价值,黄宗智也指出:“十八世纪的这种档案,是珍贵的社会史素材。它们或详录贷款人与借款人的争执,或记载雇主与雇工间的诉讼,提供了其它资料中不常见的细节内容”。“就本人的研究而言,这些资料有助于澄清以往从传统史料得出的十八十九世纪农业雇佣劳动发展的模糊印象,而农业雇佣关系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把见于方志资料的农业商品化过程和自然村内部的社会经济变化连接起来。”^{[1]47-48}在阅读刑部档案过程中,黄宗智偶然发现了过去学者没有使用过的宝坻县刑房档,“该资料并非一个完整的县署档,而只包括 1800 至 1911 年的残件,主要是诉讼案件。内容涉及婚姻、遗产、债务等的纠纷,也有关于镇压群众运动的材料。……县刑房档的内容比刑科题本的摘要报告更为翔实丰富”,“宝坻县档为我们提供了国家与自然村关系中关键的赋税和乡保的资料。它提供了可以据以了解二十世纪国家、村

庄关系的变化的一条底线”。^{[1]48-49}由于宝坻县与作者大量使用的满铁资料在地域上的重合,使得黄宗智的区域长时段研究最终成为可能。在第十三章“清政权下的村庄”中,黄宗智大量采用了宝坻县的刑房档的材料,如在“二十世纪前的村庄与国家”一节中,他大量采用顺天府档,论述了地方乡保与村庄领导层的冲突,包括乡保承担赋税的征收以及其它的职责,地方领导不愿担任乡保的现象以及一些乡保趁机谋取私利和滥用公安权力,个别乡保甚至不受法律制裁等等社会现象,这些对于进一步理解清代基层权力的运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档案材料大量采用的同时,结合满铁及其它资料和相关学者的论述,黄宗智进一步论述了 19 世纪的自然村与士绅、宗族、自然村内生的权力结构、共同体领导抑或国家权力代理人、自然村和农民的集体行为、清代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等重要的社会史内容。

二、实地调查访问资料对研究的推动

在重视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的同时,黄宗智对于实地考察也非常重视。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黄宗智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调查资料,这使得他的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有了新的亮点,达到了新的境界。

早在 1980 年,在撰写《华北》一书的时候,黄宗智就利用在中国访学的机会,除了钻研档案资料外,还两次到满铁职员访问过的两个村庄实地调查,以检验满铁资料的可信度。1980 年 4 月和 11 月,黄宗智两次到沙井村调查访问,不仅验证了当年满铁资料的真实性,而且了解到当年日本学者曾帮助中国村民并为其伸冤的情况。通过实地调查,黄宗智也纠正了不少错误认识。如,关于华北平原的闭塞性,就是和沙井村 70 岁的中农李广志以及平谷县北大关的多位农民长谈之后,纠正了施坚雅市场结构模式对中国的不适应。通过对村民张瑞、张守俊和李广泰的访问,他注意到中国农民对外界的了解问题情况异常复杂。^{[1]231-233}通过实地访问,他还了解到沙井童养媳比较罕见,农民的婚宴在食物的质量和邀请的人数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1]266-268}所有这些社会调查都丰富了著作的相关内容。

如果说,黄宗智《华北》一书的资料工作主要是建立在丰富的满铁资料和广泛的档案材料并加以巧妙采用的基础上,那么,《长江》一书则主要是立足于实地采访和地方志材料的采样分析。而《长江》一书能够延伸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更是得益于黄宗智社会调查所获得的大量丰富的资料。1983 年、1984 年、1985 年以及 1988 年,在南京大学吕作燮等学者和松江县外事办的帮助下,黄宗智先后 4 次用了大约 3 个多月的时间,与广大村民进行了 101 次长达

328 小时的访问座谈,对松江县华阳桥乡的薛家埭等 6 个自然村 1930 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化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2]366-383} 黄宗智对松江县华阳桥详细认真的社会经济调查,积累了大批丰富而翔实的资料。除了在华阳乡召开座谈会之外,黄宗智还在松江县农委、供销合作社、县志办调查和查阅相关资料。另外,他还在吴江县以及南通市进行了调查,访问了南通市对外办、南通县乡镇企业局、第一棉纺织厂、南通市乡镇企业局和张謇研究中心等单位,收集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资料,这些资料连同他的访谈录成为他撰著《长江》一书的极为重要的资料。

运用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实地调查资料,黄宗智撰写了《长江》一书的第二编“1949 年以后”的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共计 6 章内容,几乎占全书 1/2 的分量。作者以薛家埭等 6 个自然村来透视长江三角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变化。在第九章“旧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造”中,分专节论述了这几个村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作用、三定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集体化、党政权力机构、管理权和分配权、党政权利的局限性、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和 1978 年之后的变化等内容。在整理和分析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制作了许多重要的表格,这种详细记载中国农村基层情况,在同类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在第十章“集体、家庭和副业生产”中,黄宗智分专节论述了集体化时代的过密化的倾向、劳动力的核算、集体制下的副业、农业劳动力的紧缩、新经济结构中的家庭生产、家庭生产队集体生产等问题,在相关内容中,根据自己收集到的资料,插入了 5 个重要表格。在第十三章“乡村发展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一章,以华阳桥作为典型,分节论述了集体化时代政治理论的作用、工作动机与农业生产、大跃进时期(1958-1960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年)、80 年代的改革、过去的集体制与今日的改革之对照等内容。在“农业的增长与发展”一章,则以松江县为代表来透视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并在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插入了 6 个重要表格。可以明显看出,上述丰富的内容,大多数是建立在黄宗智个人的实地调查研究所搜集到的资料的基础之上的。

早年在台湾的访学经历使得黄宗智对中国大量地方志材料非常熟悉,这也使他的区域经济史长时段研究成为可能。在这方面,台北成文书局影印的地方志成为他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华北》一书撰著过程中,黄宗智参阅了《顺天府志》、《顺义县志》、《承德府志》、《栾城县志》等地方志材料。《长江》一书更加重视对地方志材料的运用,据统计,黄宗智曾引用的地方志有《宝山县志》、《嘉定县志》等共计 44 种。^{[2]384-392} 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地方志材料花费如此巨

大的精力,确实是极为罕见的,但也正是这些地方志材料,有力地支撑了他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明代至清朝末期社会经济的区域研究。运用这些地方志资料,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的人口和耕地面积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制作了 5 个重要表格,从宏观方面反映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面貌。

黄宗智对各方面资料的综合采用,在《长江》第七章“帝国主义、城市发展与农村过密化”一章中有突出的表现。本章分节论述了长江三角洲城镇的兴起、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桑蚕业、稻米、过密性的增长、过密化与农业现代化、新的剥削形式、商人的作用、农村生活水平、农村过密化和城市发展。以地方志资料作为论述的重要基础,在本章的前三节有突出的表现,特别是在论述棉纺织业和桑蚕业的产生和发展时运用了丰富的地方志资料。在“过密型增长”和“新的剥削形式”两节中,除了地方志资料之外,还多处引用了满铁在华北和上海的调查资料。而在论述相关问题的争论和分歧时,黄宗智则对中外学者的观点都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118-147}

三、立足于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广阔学术视野

黄宗智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受美国汉学的影响,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特别是致力于梁启超思想的研究。1970 年代中后期,黄宗智先后在台湾和日本访学,1980 年代则主要在中国从事社会经济史的调查和研究工作,这些丰富的学术经历使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了融美国、日本和中国学术为一体的鲜明特色,展现了极为广阔的学术视野。

在日本的治学经历,使得黄宗智对于满铁资料和日本学者编著出版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等重要资料能够运用自如。此外,他对于日本学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也能够广泛地借鉴和吸收,这一显著特点,在《华北》和《长江》两部著作附录的引用书刊目录“日文”部分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作为一个美国学者,黄宗智对于美国和欧洲汉学界关于中国的研究了如指掌,因而,他的著作又参考了大量英文和一些法文的代表性论著。《华北》一书,有早年老一代学者的多部论著,如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乡村生活》,卜凯的调查研究论著《中国的土地利用》、《中国的农场经济》,马龙和泰勒的《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其引用的著作也包括不少华裔学者和早年在美国留学的著名中国学者的成果,如萧公权、何炳棣、张仲礼、瞿同祖等学者的论著。费正清、施坚雅、费维凯、刘广京、孔飞力、弗兰克、裴宜理、德里克、周锡瑞等美国著名汉学家及其代表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更是通过黄宗智的《华北》一书而走入中国广大学人的学术视野,受到中国学术

界的重视和学人的青睐。《长江》一书同样参考了大量英文著作,据统计多达110余部,陈翰笙、费孝通等早年相关的英文著作,也在引用之列。

对于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充分关注和吸收,在黄宗智的农村经济史研究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如,在《华北》一书中,关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资料,引用了李景汉的《定县社会调查概况》(1933年)、费孝通的《乡土重建》(1948年)等13份珍贵的资料,还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行政院复兴委员会、河北省棉产改进会的多份调查报告,更有严中平、李文治、张维华、章有义、梁方仲、傅筑夫、胡如雷、王毓瑚、戴逸等多位学者的代表性论著。其参考的中国学者的重要论文,除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中的文章之外,还引用了翦伯赞、尚钺、王毓瑚、李文治、陈振汉、陈诗启、傅衣凌、经君健、黎澍、刘永成、樊百川、陈平等学者的多篇研究论文。此外,还包括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文章,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浩然的《艳阳天》的资料。^{[1] 339-345}

《长江》一书对中文资料的引用更加纯熟和广泛。除了对地方志大量材料的采用之外,在资料的采择方面,也表现出显著的特点。首先是重视权威机构和大型统计资料,如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和统计资料,这有助于从宏观的角度展开对问题的论述。其次是重视中国史学家和经济史专家的相关研究成果,如吴承明、方行、李文治、缪启愉、宁可、李伯重、徐新吾等多位中国学者的论文和论著。值得一提的是,《长江》一书还对地理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的论著进行了参考和引用,如谭其骧、陈吉余、马正林、徐近之的论著和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编著的太湖历史地理调查简报、《江苏农业地理》、《江苏省近两千年洪涝旱潮灾害年表》等。而且,他还参引了一些台湾地区学者和日本学者的论著,如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研究》、《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论文,潘敏德的《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陶煦的《租赈》等资料。^{[2] 384-392}

四、黄宗智史料运用的评价问题

建立在丰富的满铁资料、珍贵的档案资料和多次实地考察基础之上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加之兼融美国、日本和中国广阔的学术视野,使得黄宗智在历史学研究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黄宗智的两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著作的问世,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早期的宏观政治史研究发展到对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微观和中观探讨的新阶段,并且开创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先河。正由于此,他的两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

史区域研究论著,分别荣获了1986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1992年美国亚洲学会勒文森奖。这两部论著的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后,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黄宗智一直强调历史资料对研究的重要性,他说:“首先,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有经验的历史学家。我自己研究的起点总是一开始鉴别一大堆迄今还没有发掘的或发掘不够的材料,然后从中找出新的经验信息。我转向学术理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与理论的联系和对话来构造我自己的一些基于经验发现的概念。从认识方法上讲,我有意识地努力从经验研究出发到理论,然后再返回到经验发现,而不是从相反的路径着手。我并没有把我自己看做是理论家,我也没有资格以理论的方式来谈理论”^[3]。正是由于掌握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才使得黄宗智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为可能,而且出版了两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大陆的出版,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也推动了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热潮的出现。随后,满铁资料、档案资料和社会历史调查的方法,都受到了大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热门。

尽管黄宗智在历史资料搜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正如他的“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等观点在学术界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样,在史料运用方面,也有学者指出了黄宗智存在的不少问题。如有学者指出,《长江》中明清时期乡村经济之研究的事实判定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文字类史料问题,二为数据类史料问题。文字类史料问题主要包括:1.无史料支撑的论述;2.史料极不充分,以致无法有效地证明其相关论点;3.二手史料问题——该书有关明清时期的论述、分析大量依据今人研究成果,但很少加以考证,以致该书所引用的说法常常与被引用文献的原文内容不符甚至矛盾;4.史料的时间或地点与其论点中指陈的时间或地点不符。数据类史料问题主要包括:1.有些统计结果因样本数量严重不足而不具备充分的有效性;2.统计表中的数据时间与其史料中的实际时间不一致;3.统计表内相关地区的行政区域隶属关系错误或与这些行政地区的实际历史变动不符,以致不同时期的数据之间不具备可比性;4.有些二手数据与被引用文献原文矛盾;5.同一组数据中的统计标准不一致。^[4]

学者指出的黄宗智先生《长江》一书史料运用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是否能够成立,尚待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否认黄宗智在史料运用方面花费的巨大气力、做出的艰辛的努力以及在史料运用方面的(下转第48页)

- [40] 张建华,唐艳.近 10 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综述[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 (6):83-88.
- [41] 张建华.新旧俄罗斯的相遇与歧路——欧亚主义视野下俄罗斯复兴之历史思考 [J].学习与探索,2006 (2):32-38.
- [42] 张海鹰.俄国欧亚主义的三个思想来源[J].西伯利亚研究,2009 (5):55-57.
- [43] 张海鹰.欧亚主义——俄罗斯思想的历史遗产[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 (9):100-101.
- [44] [俄] 彼得罗夫 B.Л. 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87.
- [45] 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85.
- [46] 张树华,刘显忠.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09.
- [47] 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81.
- [48] 伍宇星.俄国历史哲学语境中的欧亚主义[D].广州: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118.
- [49] 粟瑞雪.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思想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09:78.
- [50] 张海鹰.俄国古典欧亚主义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2010:184.
- [51] 李英玉.欧亚主义与俄罗斯的复兴[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2010:28.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Russian Classical Eurasianism

SU Rui-xue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5,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cholars initially regard "Eurasianism" as a philosophical thought. Based on translation of classic works of Eurasianist thinkers and Russian (USSR) researches of Euro-American scholars, they made careful studies and put forward their own view on the original works and foreign research status.

Key words: Chinese scholars; classical Eurasianism; Russia; Savitsky

(上接第 35 页)重要开拓和贡献。对于学者提出的上述问题以及在理论问题争鸣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如果黄宗智先生能进一步加以深入研究和圆满解决,相信他的《华北》和《长江》这两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代表性论著的学术水平会进一步提高,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也会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也正是我们对黄宗智先生和中国历史学界的期待,这些问题的全面解决,需要更为扎实的材料、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中外学者更进一步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 [1]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3]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2.
- [4] 苏新红.黄宗智“过密化”理论中的事实判定、逻辑分析与模式建构问题——以《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为中心[J].古代文明,2009 (1):82-96,113-114.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Application in the Huang Zong-zhi's Study of Chinese Rural Socio-Economic History

ZHANG Jian-ping¹, DAI Xiao-jie²

(1. School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2. Office of Veteran Cadres Administr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 data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Huang Zong-zhi's study of Chinese rural socio-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related theoretical establishment. In his two books—*North China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s* and *Small-Scale Peasant Famili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the historical data contain three aspects: Japan's Manchuria railway survey data,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personal interviews. With a broad academic v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China, Huang Zong-zhi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is very influential in the historical circle, both domestic and abroad. Although he made great efforts in data collection,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some of the problems in data application. It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to find more solid materials needed for comprehensive and scientific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 Huang Zong-zhi; study of Chinese rural socio-economic history; historical data; application